

印中分歧與臺印關係的開展 （1961-1966）

廖文碩

摘要

本文探討1961-1966年間尼赫魯逝世前後印度對華政策出現變動之際，中華民國對印度的接觸、試探與爭取歷程。臺北當局開展對印度關係之目的，為運用印度與中共之矛盾，一方面在未來反攻大陸戰場上對中共產生牽制作用，嘗試於印度邊境推進西南敵後滲透工作，一方面增強外交形勢，爭取不結盟國家轉向反共陣營，以確保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與中華民國政權合法性。臺印關係於即將開展之初，即遭遇蘇聯與中共阻撓，美國亦不願介入。臺印層峰為與中共抗衡，皆以軍事情報合作為重，利益有所交集。然而雙方基本立場差異懸殊，共同利益有限，關係難有進展，過程曲折。本文運用中英文解密檔案，考察南亞大國關係及戰略重整關鍵時刻，臺印互動所牽涉之複雜因素與結構性問題，為臺印關係發展史、亞洲冷戰史補白，並重新加以詮釋。

關鍵詞：尼赫魯、反共、軍事情報合作、反攻大陸、聯合國中國代表權

India-China Dispu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India Relations, 1961-1966

Wen-shuo Liao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s exploratory contact with India during a period of wavering in India's policy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rom 1961 to 1966, around the time of Jawaharlal Nehru's death. The objectives of the ROC's pursuit of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were, firstly, to contain the PRC in ROC's planned counterattack on the mainland, allowing infiltrations by the ROC forces behind enemy lines along the Indian-Chinese border. Secondly, the new relationship would strengthen the ROC's diplomatic situation, attracting non-aligned countries to join the anti-communist camp, and ensure ROC's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regime legitimacy. ROC-India rapprochement encountered obstructio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 unwilling to intervene.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the PRC, the ROC highlighted its shared interest with India in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basic posi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were vastly different, and their mutual interests limited,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ir relationship to develop. The process of rapprochement was therefore tortuous and not fruitful. Drawing on declassified government documen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the complex factors and structural issues involved in this diplomatic endeavor at a critical moment in major power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reorganization in South Asia. Its findings shed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India relations and on Cold War in Asia.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Keywords :Jawaharlal Nehru, Anti-communism, Return to the Mainl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印中分歧與臺印關係的開展 (1961-1966)^{*}

廖文碩^{**}

壹、前言

1960年代，冷戰格局走向多極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面臨現實與理想鴻溝日深，各方挑戰嚴峻。面對西方陣營先有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與外蒙入聯案有關「兩個中國」問題的歧見與妥協，繼則法國與中共建交重擊。蔣介石高舉反攻大旗，在美國阻撓等因素下，軍事行動始終以小型偵襲為主。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相繼獨立，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於印度獨立後擔任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近17年，為國家外交政策總舵手，致力領導不結盟運動，撼動國際兩極格局。然印度與中共的友好關係自1950年代末期以降因西藏事件與邊界武裝衝突嫌隙加深，1962年10月爆發短暫戰爭，尼因對華政策等失誤致光環褪色，1964年5月於任內驟逝。臺北當局見印度與中共矛盾惡化有機可乘，為運用情勢爭取印度，1963年初派密使前往試探，過去學界已有若干討論。¹

^{*} 本文初稿曾於2023年7月1日臺灣歷史學會與國史館合辦之「冷戰下臺灣的挑戰與發展」研討會上宣讀。感謝川島真、林孝庭、方天賜、許瑞浩、吳淑鳳諸位先進指教，以及匿名審查人悉心斧正。

收稿日期：2023年8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11月22日。

^{**} 國史館協修

¹ 參見林孝庭，〈冷戰與臺灣、印度之間的秘密外交〉，收入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中正：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

從臺印關係言之，印度為最早承認北京政府的國家之一，1950年代全面斷絕與臺灣往來，視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數度在聯合國提案支持中共入會。蔣介石以過往扶持印度獨立，視尼赫魯背信忘義，卻又長年關注尼言行以及印度與中共關係，顯示印度在蔣心中始終占有一席之地。² 1960年代外交部部長沈昌煥曾言，印度在亞洲以至於全世界具有相當影響力。³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外交部次長沈鎬任內擔綱推動對印工作，亦指蔣甚為重視對印關係。⁴ 過往研究已詳述1963年初臺方密派香港文化人士張國興赴印度「破冰」，因過分高調功敗垂成等經過，多以此後臺印關係仍續冰封。檢視國史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等，可見臺方與印度互動先於張國興任務，亦未以此為終點。臺灣對印度經過接觸、試探、爭取等歷程，雙方關係於1961-1966年間確有相當突破。

從亞洲冷戰史觀之，1962年中共與印度邊界開戰，西方大國美、英延續對西藏事件支持印度立場，迅即公開警示中共，並提供實質軍事援助。蘇聯則先是譴責邊界問題為帝國主義惡果，對印度與中共衝突持觀望態度，然而面對印度向美國傾斜、蘇中共歧見加深等局勢變化，轉而大力發展對印度關係。印度面對中共優勢武力，運用蘇中共分歧，分別向美蘇陣營尋求軍援。中共對印度關係持續惡化下，與巴基斯坦成為戰略夥伴，為1965年印巴戰爭發展埋下伏筆。⁵

臺北當局於南亞大國關係與戰略結構重整關鍵時刻進入印度活動，可從三方面探討：其一，凸顯美國與臺灣有關圍堵亞洲共產主義目標的基本差異，臺方以

頁239-266；陳牧民，〈解密臺灣與印度外交檔案：1962年中印戰爭後的臺印互動關係〉（2020年7月7日），收錄於「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sino-indian-war-taiwan-secret-diplomatic-archives/>（2023/02/24點閱）。

² 廖文碩主編，《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彙編（1946-1950）》，第一冊（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年），頁III-X。

³ 「沈昌煥簽呈行政院院長」（1964年7月11日），〈尼赫魯去世後印度局勢之發展我方因應方針〉，《外交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53/4-5-4-31/2/0001。

⁴ 沈鎬，《我的一生——沈鎬回憶錄》，第五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頁90。

⁵ Tanvi Madan, *Fateful Triangle: How China Shaped US-India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0), pp. 151-185; 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國關係與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根據新的檔案文獻的國際史的研究〉，收入戴超武編，《亞洲冷戰史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頁233-287。

反共戰爭定位印度與中共邊界衝突，並嘗試以印度邊境為獲取中共軍事情報與對西南各省反攻據點，美國則力圖避免臺北當局與中共大規模戰爭。其二，蘇聯與中共交惡，共產主義陣營逐步瓦解，蘇聯對印度關係深化，既為制衡亦是顧忌中共，形成臺方爭取印度阻力。其三，臺方於「兩個中國」論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嚴重之際，發展與亞洲非共國家關係變得迫切。運用多國史料，考察小國、弱國於美蘇大國框架下如何競合，中心地帶與邊緣地區、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互動關係，為近期冷戰史研究新趨勢。⁶

本文運用大量中外文解密檔案，輔以相關人士日記、回憶錄、報刊等，首先探討1961年臺北當局首次與印度國會議員接觸，有關設置名譽領事等提議所涉及「兩個中國」問題；其次述論臺北當局將1962年印度與中共邊界戰爭定位為世界性反共戰爭，張國興以反共友人身分赴印試探，洽談設置非正式聯繫機構失利，仍促成雙方軍事情報合作、聯繫印度朝野批判中共人士；復次探討蔣介石父子認定敵後滲透與情報合作運用印度的可能性，卻凸顯和爭取的印度國會議員雙方在民主理念上存在差異；最末析論臺北外交部1965年因聯合國大會審議中國代表權案情勢嚴重，視設法與印度聯繫為急要，1966年特派次長沈錡赴印度周旋，面臨印度朝野傾向「一中一臺」理念，雙方立場差異過大，且共同利益有限，於南亞大國框架制約下，關係難有進展等過程，為臺印關係發展史、亞洲冷戰史補白與重新詮釋。

⁶ Odd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沈志華，〈近年來冷戰史研究的新趨向〉，《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6期（2012年6月），頁78-81。近年臺灣對外關係研究，參見許文堂，《理想與幻滅：中華民國外交史的1960年代》（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1年）；陳鴻瑜，《揭密：冷戰時期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軍事關係》（臺北：學生書局，2022年）。同時期亞洲多邊關係研究，參見戴超武主編《亞洲冷戰史研究》一書。

貳、首度非正式接觸：訪臺印度國會議員的提議落空

一、對印度傾向「兩個中國」論的觀察

1961年春，外交部參事王森為出席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大會，踏上印度新德里土地。王森返臺後呈報與該地人士接觸情形，尤其對印度有關國際間此際甚囂塵上的「兩個中國」論態度提出觀察。王森表示，西藏事件、邊界問題等相繼發生，印度對中共幻想已起變化。往昔印人心目中只有中共而無中華民國，如今種種印象顯示印度對中共的恐懼與惡感日增，軍方與民間尤然。據王森觀察，印度政府似已由支持中共奪取臺灣的態度，逐漸傾向接受「兩個中國」之說，然就對華政策而言僅有程度差別，並未見基本改變。⁷

按1950年代後半，隨著兩次臺海危機解除，兩岸分治時間日長，國際間如美國等同時與「兩個中國」建立實質關係者日增。1955年亞非國家萬隆會議期間，中共因迫於國際壓力主動提出以和平手段「解放」臺灣的可能性，印度曾相對提出臺海停戰、臺灣在一定時期內作為自治省、最終將臺灣統治權移交中共的方案回應，被蘇聯批判實際為延遲解決臺灣問題。依據福田圓研究，儘管印度分別在蘇聯與中共背後支持下，1950、1955-1960年間每年於聯合國大會提請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大會議程、批判美國以緩議案圍堵中共政策，印度對於中共反對兩岸被視為分裂國家，亦即反對「兩個中國」論的主張，事實上並未表態。⁸

⁷ 「王森簽呈」（1961年4月3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案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王森（1917-?），字立森，浙江吳興人，中央政治學校政治系畢，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早年曾任外交部專門委員、駐泰國大使館參事，1960年12月任外交部參事回部辦事，1960-1962年間連續奉派出席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大會，後出任外交部條約司司長及駐巴拉圭等國大使。參見〈王森（王立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10000-2972。

⁸ 福田圓著，林倩仔譯，《中國外交與臺灣：「一個中國」原則的起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頁89-92、146-151。依照美國學者Nancy Tucker看法，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即為美國實踐「兩個中國」理念的作法，美國僅在臺、澎及其附近為防衛需要而部署陸海空軍之權利，並透過換文取得臺北當局對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行動須受美

王森報告尚涉及反共宣傳與技術援助兩個面向。據王森觀察，印度朝野人士對臺灣所知甚少，對臺灣在亞洲反共上所占地位更未注意，當加強宣傳，採非官方或私人方式，邀約國會議員、退休而仍具社會地位官員等來訪，又印人在國外有意順道訪臺者，亦宜給予便利。⁹ 副總統陳誠於代表團返國召見時特別訓示，將學習採用印度訓練技術人員方法，設立訓練中心，俾派往有關友邦從事技術協助。¹⁰

二、接待首位訪臺印度國會議員

與王森呈報同月，總統府接獲印度國會議員普拉塔普（Mahendra Pratap, 1886-1979）致總統蔣介石函，表示即將啟程前往日本訪問，若臺灣有意邀訪將樂於接受，蔣指示交外交部處理。¹¹ 外交部以臺灣與印度並無邦交，所請來訪事未便處理，函請新聞局酌查辦理。在局長沈錡表示該議員既有意來訪，新聞局願負擔其在臺期間接待費用後，普氏遂得於6月下旬訪臺。¹²

普氏作為第一位訪臺的印度國會議員，與臺北當局實有相當淵源。普氏生於印度北部種姓族群賈特（Jat）家庭，早年投身印度獨立運動，為知名記者、作家、革命家，1915年印度臨時政府於阿富汗首都卡布爾成立，普氏出任主席。二戰前曾居留中國，結識孫科、于右任等國民黨人士。1957年當選印度下議院（Lok Sabha）議員，重返政界，積極遊走國際，鼓吹其理想之世界聯盟（World Federation）、博愛教（Religion of Love），延續兩次大戰期間流傳東亞的國際主義精神與亞洲統一概念，以建立人際網絡為主，理念、目標較為空泛。¹³

國同意之限制。又1955年7月美國與中共簽署公報舉行大使級會談，正式與「兩個中國」建立實質關係。參見Nancy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7.

⁹ 「王森簽呈」（1961年4月3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

¹⁰ 「外交部亞太司簽呈」（1961年5月6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

¹¹ 「總統府第一局致外交部函」（1961年4月20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

¹² 「沈昌煥致沈錡箋函」（1961年5月1日）、「沈錡致沈昌煥箋函」（1961年5月5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

¹³ “Mahendra Pratap to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1961年4月7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

依據接待普氏的沈錡描述，普氏來臺晉見蔣介石，主要有兩點提議：其一，願代臺灣向印度政府爭取允許在印度加爾各答設置名譽總領事館，但由臺方負擔相關經費；其二，鑒於印度國會中目前約有30名親中共的印共議員，卻無任何親臺議員，普氏願為臺方效勞爭取議員支持，但競選費用需由臺方負擔。普氏並簡述其世界聯盟構想及對宗教人生意見，沈錡指蔣頗為讚賞。¹⁴ 普氏訪臺期間，在新聞局安排下參觀建設、拜會黨政人士，中央通訊社並以「訪問自由中國的第一位印度國會議員」稱之，在報端上著實做了宣傳。¹⁵

三、婉拒普氏提議

臺北當局於普氏返印後，不久即收到普氏回報表示已往訪尼赫魯，建議允許臺灣在印度設立名譽總領事館，另在加爾各答建館以照顧無中共護照的中國人，盼能獲蔣復函。¹⁶ 對照尼赫魯資料集與印度外交部檔案，普氏確實於訪臺次月下旬面見尼赫魯後，旋於同日函蔣。然而依據尼赫魯同日致印度外交部官員箋函，尼顯然認為普氏意見無足輕重，對於普氏轉述蔣所言已預備推翻中共政權，臺灣有強大部隊、美國全力支持等語，僅輕描淡寫地表示「有趣」。對普氏有關臺灣在印度設置名譽總領事館等提議，則隻字未提。¹⁷

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Caroline Stolte, “Raja Mahendra Pratap's Pan-Asian projects (1929–1939),” *Modern Asian Studies*, 46:2 (March 2012), pp. 403–423.

¹⁴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二冊，頁359–361；「1961年6月24日條」，〈總統事略日記50.04~50.06〉，《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110101-00017-082。蔣於6月24日接見普氏當日日記僅簡單提及「見印度議員」，同日日記主要在抒發對美國強制亞洲盟國不許其自動自主之反共行動的怨言，《蔣中正日記》，1961年6月24日。至普氏世界大同與宗教理想，外交部亞太司卻有「不合時代潮流」的評語。「外交部亞太司有關駐日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簽辦意見」（1961年6月2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

¹⁵ 〈印度國會議員普拉塔普離華〉，《中央日報》，臺北，1961年6月26日，版5。

¹⁶ 「總統府第一局致外交部函檢附普拉塔普1961年7月24日致總統函抄件」（1961年8月5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

¹⁷ “Note by Nehru to ME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ficials: Mahendra Pratap’s Visit to Taiwan” (July 24, 1961); Mahendra Pratap’s Report, File No. 1105 (21)-SD/61, pp. 6–7/corr.,

臺北外交部向總統府申述有關普氏來函意見，指普氏提議難獲印度政府同意，政治影響力有限，判斷可謂允當。外交部主張，該提議可能導致「兩個中國」錯誤印象，臺方不便考慮，但如印度政府願以英國之例允許臺灣在印度設置新聞代表或機構，則另當別論。此事即由新聞局出面函復，說明臺灣無意在印度派設名譽領事，並略表期望印方允許臺灣新聞或文化人員赴印度之意。¹⁸ 普氏提議雖兩面落空，在臺灣與印度長年斷絕往來後，分別聯繫蔣介石、尼赫魯兩造，為臺印層峰締造首度非正式接觸。

與此同時，臺北當局與美國政府數度協商後，獲甘迺迪私人保證因而同意於「外蒙案」棄權，並接受美國以「重要問題案」取代「緩議案」，此年聯合國席位危機得以解除。尼赫魯8月中旬於印度下議院發言指出：「臺灣政府是一個非常特殊（peculiar）的政府，在於該政府連一平方碼的中國領土都未控制，但仍被稱為中國政府，而現正阻礙另一個國家蒙古加入聯合國。」¹⁹ 蔣介石隨即於次日日記寫下：「印度泥黑路十六日在其議會中，又侮辱我國所謂『這個奇異的臺灣國，擋住外蒙進入聯合國的路』，此種荒謬的以怨報德之諷刺，最為難受。」²⁰ 對尼赫魯言行關注，超乎尋常。平心而論，尼可能語帶諷刺，為支持蒙古入聯，亦言之成理。而尼言下之意不以臺北當局控制下的臺灣為中國領土，立場近於一中一臺或臺灣地位未定論，或許長年心結之外，也是蔣感到憤恨難消的主因所在。

Records of MEA, India, in Madhavan K. Palat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69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6), p. 554.

¹⁸ 「外交部致總統府第一局函」（1961年8月19日），〈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0/12.22/30/0001。

¹⁹ 同日普拉塔普曾發言要求議會參考其與蔣介石談話紀錄，尼赫魯並未回應。“In the Lok Sabha: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ug. 16, 1961), cited from “Motion 16 August 1961,” *Lok Sabha Debates*, Second Series, Vol. LVI, 7-19 August 1961, cols 2405-2431, in Madhavan K. Palat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70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7), pp. 510-511. 印度於1955年12月與蒙古建交，為共產陣營以外最早與蒙古建交之國家。

²⁰ 《蔣中正日記》，1961年8月17日。

叁、反共之聲：密使張國興試探任務

一、張國興赴印試探原委與印方反應

1963年1月，香港亞洲出版社社長張國興銜臺方密旨，赴印度活動，前述林孝庭研究主要依據美國官方解密檔案，就張國興對美國駐印、駐臺官員關於奉派經過及此行各項任務等說法，美國駐印度大使館呈報國務院相關情資、媒體報導與觀察分析，以及美國國務院對臺印互動相關評估等，有詳細探討，本文不再贅述。²¹ 至於臺北當局派使赴印度試取聯繫之原定目標，與尼赫魯立場等落差，尤其是張在印活動遭致蘇聯及中共反彈後如何調整應對，以及對印聯絡工作後續發展等，仍有討論空間。

1962年10月下旬，中共與印度邊界軍隊爆發大規模衝突，解放軍迅速占領印度控制之藏南地區及印度邊界數處軍事據點，印軍救援無力，尼赫魯宣布印北進入緊急狀態。11月6日，國民黨中央宣傳組織中四組主任謝然之旋即以「拂曉三號」行動為名，邀集新聞局、國家安全局、國民黨海外黨務僑務組織中三組等代表以及印度研究學者吳俊才座談，決議為喚醒印度當局認識中共對外侵略陰謀，修正中立主義立場，並強調中共軍事目標非單純為解決邊境問題，其主要目的在實現共產集團世界侵略藍圖等政治目標。²² 同月24日，國民黨秘書長唐縱函致行政院有關該黨嚴策同志委員會建議「請中央迅謀打開英印緬外交僵局，積極進行藏滇邊區敵後滲透工作，以加強敵後政治作戰」，除後者已由該黨敵後事務組織中二組主任葉翔之等積極進行外，前者如派員密訪以進行說服工作等建議辦法奉蔣諭交外交部參辦。²³

²¹ 林孝庭，〈冷戰與臺灣、印度之間的秘密外交〉，收入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中正：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頁239-266。

²² 「拂曉三號第一次座談會紀錄」（1962年11月6日），〈營救印匪邊境糾紛而被捕之反共華僑（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1908-0049。

²³ 「陳雪屏致沈昌煥函」（1962年12月10日），〈營救印匪邊境糾紛而被捕之反共華僑（一）〉，《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8-0049。有關藏滇邊區敵後滲透工作，詳見本文第肆節第二小節討論。

與此同時，邊界戰爭致印人仇華情緒日張、反華示威頻傳，印度政府依據「國防法令」授權，可不經法律程序嚴格管制華人行動，旅印華僑處境日艱。反共僑領葉幹中等10月底於加爾各答舉行僑民大會，並邀請印度國大黨代表、美國駐印度新聞處官員及新聞記者等參加，於大會公開表明反共態度、捐款慰勞印軍將士，會後並錄案致函尼赫魯及當地政府官員，以緩解排華浪潮。²⁴臺北外交部則透過第三方協助，並洽請美國國務院經美國駐印度大使館獲印度政府承諾，華僑除非為中共從事活動，不致對其採取行動，惟接近戰區的阿薩姆與西孟加拉北部華僑如不願遷徙，則須接受拘禁。美方並請臺方切勿公開發表，以免美方介入在印度遭致抨擊。²⁵

11月30日，外交部通電駐外各館團處檢送「關於匪印衝突之說帖」，以中共與印度邊界戰爭錯綜複雜影響甚大，政府經縝密研討，「確認此為印度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鬥爭之開始，印度安全之可靠保證，唯有放棄中立，積極參加反共陣營」。²⁶由上述中四組座談結論、外交部說帖及通電可見，臺北當局儘管視中共與印度戰爭為尋求與印度開展關係時機，對外態度謹慎低調，避免官方公開表達或接觸，其策略在將該戰爭擴大定位為世界性反共、反侵略戰爭，俾使印度由中立轉向反共陣營。依此策略思維，香港亞洲出版社負責人張國興與臺方長期往來，反共立場堅定，且與印方朝野人士向有聯繫，以海外民間友人身分，擔負試探性任務，應是合理選擇。此時印方則透過駐香港專員山甘尼（Kotda Sangani）

²⁴ 「張希哲致陳誠函」（1962年12月2日），〈營救印匪邊境糾紛而被捕之反共華僑（一）〉，《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8-0049。立法委員張希哲於函中解釋因近期兩度前往印度考察，與當地僑領頗有聯繫，戰爭爆發後曾主動去函關切獲覆。

²⁵ 「杭立武致外交部電」（1962年12月10日）、「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62年12月21日），〈營救印匪邊境糾紛而被捕之反共華僑（一）〉，《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8-0049。遲至1967年仍有反共華僑十餘人遭關押於代奧利拘留營（Deoliwallahs），由葉幹中等與印度政府斡旋後獲釋。「僑務委員會致外交部函」（1967年8月10日），〈營救印匪邊境糾紛而被捕之反共華僑（二）〉，《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8-0050。另參Joy Ma and Dilip D'Souza, *The Deoliwallahs: The True Story of the 1962 Chinese-Indian Internment* (New Delhi: Pan Macmillan India, 2020)。

²⁶ 「外交部情報司代電檢送匪印衝突資料由」（1962年11月30日），〈情報司雜卷：五十一至五十二年（三）〉，《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99999-0047。

向臺北新聞局駐香港代表陳亦轉達，歡迎記者前往印度採訪。12月中旬，新聞局與國民黨中四組、外交部等有關單位會商後，旋即電邀張國興赴印度一行。²⁷

張國興抵達印度不久，美國雜誌《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刊登尼赫魯針對邊界戰爭專訪，文中提及中共政府與蔣介石在邊界問題上看法如出一轍，諸如尼曾要求中共修正蔣政府舊地圖，卻被中共確認後宣告地圖無誤。尼並感嘆印度過往堅定支持中共，未料1959年秋即進犯印藏邊界，印度乃以前進政策相應。然尼赫魯強調，自己一向認為中共對印度攻擊行動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無關，基本上就是中國本位主義（Chinese-ism）思想作祟。²⁸ 與臺方將邊界衝突定位為世界性反共戰爭，截然不同。

張國興拜會尼赫魯、印度國防部及外交部層峰等高調作風，旋即引致當地媒體關注。美國國務院於3月中旬曾警示臺灣駐美大使館，指張如執行臺方任務，其言論舉動務須慎密。²⁹ 對照臺方檔案與林孝庭所引用美國駐印度大使館情報資料，可見美使館對張國興在印度活動日程、與印度政要會晤經過與談話內容等細節，皆能充分掌握，並即時呈報美國務院，在在顯示美方對臺印互動的重視。³⁰ 究竟張國興是否經臺方授權，對美方包括駐香港領事、駐臺代辦等詳作報告，或張以首任臺灣駐印度代表職位為目標，爭功表態，抑或美使館有其他情報來源，則仍可議。然而臺方於自身國力與國際政治情勢制約下，對與中共有抗衡作用的印度進行試探，美國雖不願介入，只要不對美國有不利影響，顯然亦不至反對。

²⁷ 「有關張國興君赴印試取聯繫經過之報告」（1963年3月），〈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張國興於1940年代後期曾批判蔣介石，其後似因個人遭遇，立場丕變。據美國著名反共作家Edward Hunter描述，中共政權成立未久，張在香港即有《鐵幕後八個月》一書出版，揭露中共內幕。Edward Hunter, "Defeat by Default," *American Mercury*, September 1952, p. 43,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3, <https://archive.org/details/defeat-by-default.-american-mercury-september-1952-pp.-40-51/page/43/mode/2up>.

²⁸ Robert Sherrod, "Nehru: The Great Awakening" (Jan. 19, 1963), in Madhavan K. Palat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80, pp. 744-751, esp. 745, 747.

²⁹ 「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63年3月14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³⁰ 林孝庭，〈冷戰與臺灣、印度之間的秘密外交〉，收入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中正：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頁246-250。主要引用2001年出版之1963年2月至1966年1月美國國務院有關中國政治、政府與國防事務機密文件微捲檔案。

二、從駐印度聯絡代表處構想到借重亞盟聯絡員

另一方面，新聞局於接獲張國興在印回報後，旋即呈報行政院建議宜及早依照印方承諾，立即派員前往籌設非正式與非官方機構，以免情勢生變。依新聞局之見，最初僅在新德里一處設置，委派極少數人員，協商交換軍事情報、提供心戰廣播人才、人員互訪等。³¹ 同月上旬，新聞局承接上年11月國民黨中央「拂曉三號」行動等規劃，邀集負責大陸敵後工作中二組葉翔之、負責國際情報合作國安局黃德美、外交部、中三組等代表交換意見，結論以現階段派員赴印，主要目標在「爭取印度朝野人士同情與了解，離間印度與匪及共產集團之關係，減少印度在國際會議上予我之阻礙，從而削弱中立主義反我之聲勢」，其他目標應屬次要。³²

3月中下旬，自印返臺的張國興向臺北高層陸續報告其兩個月來工作經過。檢視蔣介石見張前後日記述及與印度相關者僅在軍事情報工作方面，並與蔣經國約談準備派員赴印，期間召見沈昌煥、俞大維等主談對美外交與軍事問題，關切美方阻止臺方反攻準備，以及蘇聯、中共對寮共擊落國際觀察團飛機態度等情勢發展，某種程度證實了張國興對美國駐臺人員所言，臺北層峰此際僅重視與印度軍事情報交換，對其他合作議題並不甚關心。³³ 蔣聞尼赫魯問候、尼赫魯之妹表示願來臺訪問，卻又不願公開，僅表示此為印人投機慣性，或可見蔣對與尼赫魯接觸事，仍持開放態度。陳誠則是在張返國前即收其報告印度情形，認頗具參考價值，囑分送蔣經國、沈昌煥參考。陳誠在兩度接見張國興時指示原則，以臺方並無對不起印度之事，現亦無求於印度，如印度有意與臺方合作或派員來訪，或需臺方派員協助，「自可予以考慮，但絕不可主動請求」。³⁴

³¹ 「有關張國興君赴印試取聯繫經過之報告」（1963年3月），〈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³² 「行政院新聞局呈行政院副本外交部」（1963年3月13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³³ 《蔣中正日記》，1963年3月16、22、23、24日，包括16日述及印度「情報局長托其〔按：張國興〕約蔣經國擇地密會」，22日思考「對印度聯絡人員，須將匪在西藏兵力與番號查明」，24日與蔣經國談「對印度派員之準備」；林孝庭，〈冷戰與臺灣、印度之間的秘密外交〉，收入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中正：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頁256。

³⁴ 陳誠著，林秋敏等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三冊，頁1700、1719-1720、1734。

4月下旬，新聞局就「中華民國駐印度聯絡代表處」工作計畫綱要草案等呈請行政院核示，規劃人員配置含正副代表、情報官、心戰官共4人，派張國興出任代表，赴印準備已大致就緒。與此同時，事態轉變已顯，新聞局日後得知，中共外交部曾於4月6日照會印度，所提要求之一，即為澄清有關印度政府與臺方接觸的消息，足證印方所承受壓力之大。³⁵ 次月蔣介石指示：「代表處似應緩設，先派員聯繫為宜。」新聞局奉核改派連絡代表一人常駐印度新德里，仍由張國興充任，駐印工作目標及項目不變。³⁶ 張國興原擬該月即前往新德里，先經印方告知延緩一個月，6月初又生變，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印度總會觀察員史瓦魯普（Rama Swarup）分別致函張國興與中華民國總會會長谷正綱密告，尼赫魯已不願張國興再入印度。³⁷

據史氏消息管道，尼赫魯改變態度主因在蘇聯、捷克、波蘭等國駐印度大使連番抗議印度政府與臺灣接觸、允諾臺灣非正式機構駐印，乃至印度駐蘇聯大使館亦遭受莫斯科高層壓力。而印度國會上次會期間，尼赫魯面對印度前駐聯合國大使梅農（V. K. Krishna Menon）所支持印共團體成員質詢有關與臺方接觸事，不願清楚答覆，反啟人疑竇。³⁸ 印度自與中共邊境衝突後，凸顯國防劣勢，為制衡中共，此時正積極爭取蘇聯援助，相較於臺灣，蘇聯顯然為印度首要考慮。

同月下旬，張國興自香港致函新聞局長沈劍虹、國安局副局長黃德美，報告與印度外交部次長戴賽（M. J. Desai）、駐港專員山甘尼在港長談內容，證實印方要求張不得再去印度。臺方人員只能以印方「聘用人員」身分前往，駐在新德里必須保持緘默、秘密，僅得與戴賽一人保持聯繫，而不能與外界公私人士，尤

³⁵ 「行政院新聞局呈行政院關於展開對印度工作案」（1963年4月25日）「沈劍虹致朱撫松函」（1963年6月11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³⁶ 「行政院新聞局呈行政院副本外交部」（1963年5月25日）、「沈昌煥致陳雪屏箋函」（1963年6月17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³⁷ 「沈劍虹致朱撫松函」（1963年6月11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³⁸ 「Copy of letter by Rama Swarup to Ku Cheng-kang」，〈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其是印度政府任何部長會晤。印度政府仍希望臺方在情報方面提供協助，但交換情報聯繫應在第三地為之，以免擔負任何政治方面義務。張國興則建議黃德美仍依印方請求，次月中旬赴新德里商討情報交換工作。³⁹

至此，印方已明確否決臺方原欲建立非正式聯繫機構乃至派駐人員的構想，僅維持雙方情報交換合作事項。臺方如上述除同意張國興於7月初去函山甘尼表示抗議，同月中旬由「拂曉三號」行動謝然之主持「對印工作案座談會」決議，經由張此次與印度所安排各項接觸均應告結束，新聞局駐港代表不得主動與印方聯繫。印度如要求人員交換互訪及農業合作，可考慮酌辦，亞盟方面與印度聯繫路線因供應消息正確，仍應繼續。⁴⁰ 8月上旬，沈劍虹將座談會結論簽呈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強調經衡察印方各項表示，「進一步與印方採取聯繫之門並未關閉，必要時我仍可物色其他適當人選赴印工作」，張羣以專報上呈蔣介石，蔣卻批示：「不辦」。⁴¹

值得一提的是，反共立場堅定的史瓦魯普作為臺方可靠的消息來源，先後以亞盟印度分會秘書、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代表、新聞局駐印度聯絡員等身分，長年擔任聯繫臺灣與印度的橋梁。而蔣介石此刻雖未批准必要時派員赴印度工作，仍由蔣經國廣續籌酌對印度軍事情報合作，兩個月後蔣介石尚親自接見訪臺的印度反對派領袖，臺北當局並廣為宣傳，所考量者則有運用印度作為反攻大陸計畫一環之意，以下討論之。

³⁹ 「張國興致沈劍虹、黃德美函譯文」（1963年6月28日），〈中印（印度）外交關係文件〉，《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3110602/0023/001。黃德美（1914-?），祖籍福建龍溪，家族世居印尼蘇門答臘，中央軍校、美國參謀大學作戰系及研究院畢業，戰後歷任國防部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指揮辦公室主任、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國家安全局副局長。〈黃德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220000-2291。

⁴⁰ 「對印工作案座談會紀錄」（1963年7月12日），〈中印（印度）外交關係文件〉，《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3110602/0023/001。

⁴¹ 「沈劍虹呈張羣」（1963年8月8日）、「張羣呈蔣介石」（1963年8月10日），〈中印（印度）外交關係文件〉，《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3110602/0023/001。蔣介石於8月13日批示。

肆、「反攻應自西南」：爭取印度議員與對印度的運用設想

1963年1月張國興赴印度接觸之前，臺北當局升溫的反攻大陸計畫已屢屢受挫，美方向蔣介石明白表達不支持大規模正規作戰，對於蔣主張反攻行動將成功引爆中國大陸人民起義的可能性抱持存疑，強調美方對臺灣協防條約僅有防禦承諾，反對蔣單方面發動軍事攻擊。蔣自1950年代後期以降研擬以空降特種部隊登陸中國大陸西南邊區，配合於泰、緬、寮等邊區據點的游擊部隊，推進發展敵後反攻計畫，在滇緬游擊隊被美方施壓撤臺後，一度改以華南與東南沿海地區為目標，力圖爭取美方各項支援，期間蔣經國擔負重要角色，學界已有大量研究。⁴²學界未曾指出的是，儘管張國興赴印未能達成臺灣建立駐印非官方聯繫機構原意，蔣介石父子著眼於印度與中共矛盾未解，仍在軍事情報合作與反攻行動上認定運用印度的可能性，1963年10月下旬來訪的印度最大反對黨自由黨（Swatantra Party）秘書長馬薩尼（Minoo Masani, 1905-1998）似有所作用。

一、對印度自由黨領袖馬薩尼的爭取及理念異同

前述張國興訪印報告指出馬薩尼在邊界衝突期間曾發表親臺言論，張在印時即已致函沈劍虹轉達馬訪臺意願，希望應臺大校長錢思亮邀請，以講學之名來臺講授國際事務等。⁴³馬薩尼早年思想左傾，長期投身印度獨立運動，與尼赫魯曾為摯友，1940年代轉向支持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當選國會議員，為1959年成立之自由黨核心人物。⁴⁴馬薩尼訪臺前曾特別拜訪臺灣駐美大使蔣廷黻，表示此行為

⁴² 舉要如牛大勇，〈「拴緊韁繩」與「反攻大陸」：肯尼迪與蔣介石的戰略之爭〉，《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37卷總200期）（2000年7月），頁172-183。近期研究可參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臺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21年），第5章；陳鴻瑜，《揭密：冷戰時期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軍事關係》，第5、8章。

⁴³ 「Copy of letter by Chang Kuo-sin to Jimmy Shen」（1963年1月26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錢思亮時任亞盟中國總會常務理事。

⁴⁴ Aditya Narayan Sharma, “Minoo Masani is India’s forgotten liberal who went against Nehru’s

了解臺灣建設情況，並蒐集中共資料，以便在心戰上能予運用。蔣廷黻以此人甚具爭取價值，密電請外交部盡力促成。⁴⁵

馬薩尼旋以其堅定反共立場獲邀訪臺，拜會臺北層峰人士包括蔣介石、沈昌煥、國防部長俞大維、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等，可見受重視程度。蔣介石與馬薩尼談話主要涉及二方面：一是1959年初西藏事件，蔣同年3月下旬發表〈告西藏同胞書〉，允許馬自由引用，馬表示當盡量為臺方宣揚，藉以消釋一般人誤解。二是中印邊界麥克馬洪線問題，蔣指出當局正集中全力從事反共抗俄鬥爭，無暇對此項問題作深入研究，須待恢復邦交後，始有談判可能。⁴⁶

檢視馬薩尼在臺北舉行記者會所發表聲明內容，馬與臺方認知，顯然頗有差距。馬於聲明中指出，印度人普遍認為中共與臺方在藏印邊界問題等立場相同並無根據，然就西藏而言，蔣承諾賦予藏民自決權包括選擇完全獨立之自由，可見臺方與中共的立場相反。⁴⁷然檢視蔣文告所稱中共政權覆滅後，當本民族自決原則，達成藏人對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願望，並未承諾任由藏人獨立。⁴⁸實際上，蔣見馬當天日記，甚且嚴厲批評馬對西藏看法：「約見印度自由黨領袖馬某，約談四十分時，印度人對西藏之野心皆無異也，亦由俄人之對我新疆與東北也。」⁴⁹

all-pervasive socialism” (19 February, 2022), *The Print*, accessed March 21, 2023, <https://theprint.in/opinion/minoo-masani-is-indias-forgotten-liberal-who-went-against-nehrus-all-pervasive-socialism/836948>.

⁴⁵ 「蔣廷黻電外交部」（1963年9月24日），〈印度反對黨領袖 Minocher R. Masani（馬薩尼）訪華〉，《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2-0022。

⁴⁶ 「印度反對黨領袖馬薩尼先生拜會外交部與沈部長談話紀錄撮要」（1963年10月21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⁴⁷ 「Statement made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Taipei on October by Mr. Masani, member of the Indian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watantra (Freedom) Party of India」（1963年10月24日），〈印度反對黨領袖 Minocher R. Masani（馬薩尼）訪華〉，《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2-0022。

⁴⁸ 參見蔣中正，〈告西藏同胞書〉（1959年3月2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三「書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4年），頁222-223。

⁴⁹ 《蔣中正日記》，1963年10月20日。

馬薩尼向沈昌煥則提出建議臺灣應如民主國家，允許在野青年黨、民社黨籍立委訪印，⁵⁰ 或許難為臺北當局所接受，但馬在公開場合一再呼籲印度與臺方應恢復邦交，宣稱「在上次大選中，占印度選民總數39%的印度所有反對黨都要求與北京斷絕外交關係」，乃至以雙方「聯合軍事行動來解決大陸上的中共問題」等言論，想必頗得臺北高層注目。⁵¹ 馬薩尼返印後，連續撰文主張臺方反攻計畫極可能成功，美國如不積極協助，恐將引起反美運動，甚至驅使中國大陸籍人士求助中共，頗有警告美國用意。⁵²

二、反攻計畫下蔣介石父子運用印度設想

與此同時，兩蔣正持續爭取美國支持臺方發動局部空降登陸計畫，以備進一步的反攻行動。1963年9月，蔣經國赴美拜會總統甘迺迪、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肯定美方公開承認中共持續發展的潛在威脅，美蘇關係和緩情勢下，蘇聯不可能援助中共，目前正是解決中國大陸問題而不致引發重大衝突時刻。臺方同意必須以政治而非軍事解決問題，但政治手段的定義包括政治戰、心理戰、外交行動、沿海突襲、空投部隊等，臺方行動僅需美方同意及後勤支援。美方則答覆不願觸發大規模衝突，否則將使中蘇共重修舊好，對中國大陸採取重大行動而能避免蘇聯干預危險的時機尚未到來，而且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美國的利益在於讓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取得成效。⁵³

1964年4月，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訪臺，與蔣介石有深入長談，會談涉及中蘇共爭執、臺方對中國大陸採取行動之可能性、美國在越南之政策、蔣對美國政策之看法等四大主題。魯斯克直言臺北當局對中國大陸用兵，蘇聯必

⁵⁰ 「印度反對黨領袖馬薩尼先生拜會外交部與沈部長談話紀錄撮要」（1963年10月21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⁵¹ 〈印議員馬薩尼主張，中印兩國恢復邦交〉，《中央日報》，臺北，1963年10月25日，版3。

⁵² 「亞東太平洋司簽呈外交部部長」（1963年11月30日），〈張國興赴印度工作〉，《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2/12.21/3/0001。

⁵³ “Draft Minutes”(September 10, 1963), in Edward C. Keefer and others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383-385.

將支援，又中共如進入東南亞，致使越南情勢惡化，美國將不會撤退，如此可能導致對華南的危害。蔣回應臺方於發動大規模反共運動之初，需要美國支持，且不致使美國招致危險。蔣進一步指出，可在與越南、寮國、泰國、緬甸及印度接壤的西南各省以游擊活動創造機運，此一區域距離蘇聯甚遠，蘇聯不致發生興趣，自不需擔憂其干預。⁵⁴ 此次會談很有可能為蔣首度向美方表達有意運用印度作為西南邊區反攻行動的一環。

美方隨後對於臺方在印度進行蒐集中共軍事情報工作上，確實提供了支援。按臺方繼1959年西藏戰事後密派國民黨中二組駐印度聯絡專員蔡定中等向嘉樂頓珠、西藏抗暴軍代表等親致宣慰，密商賡續聯絡川、甘、青、藏等在印度志士及青年子弟，持續支持策動武力抗暴革命運動，部分由美方提供情報與空降等支援。⁵⁵ 1963年3月下旬蔣介石於接見張國興後，旋要求蔣經國準備對印度派員，次月中旬蔣經國曾約見黃德美「談印度情報合作有關問題」。1964年4月初，蔣經國復會見國安局陳大慶、黃德美，「商談有關對越南、寮國、印度與西德之情報合作問題」。⁵⁶ 同年8月，一個由臺北國防部情報局執行，與美印合作的「後門小組」正式成立，旨為有效掌握康藏等地區中共軍民用無線電通訊活動，在印度據點偵蒐。後門小組設於印度東部卡巴提亞印度軍情局專用機場，美國援助該

⁵⁴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cretary’s Visit to Taipei” (April 16, 1964), in Harriet Dashiell Schwar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pp. 41-49；「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會談關於反攻大陸策略等之談話紀錄」（1964年4月16日），〈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八）〉，《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5-00070-002。

⁵⁵ 蔡定中，空軍官校第21期畢，西藏葛樂部族酋長三王子、西藏貴族執政領袖宇拉扎西道珠女婿，因與西藏有特殊淵源，奉派赴藏策動抗暴運動，並任國防部情報局駐印度站負責人。依據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呈蔣介石報告，聯繫支援川甘青藏抗暴運動係自1956年起開始進行，至1959年4月呈報止計與嘉樂頓珠等反共抗暴首領23名獲致聯絡，依報告所附聯繫支援概況表，臺北當局多於印度與抗暴首領取得聯絡，商洽支援原則與細部事項。「鄭介民呈報蔣中正關於川甘青藏抗暴運動聯繫支援情形暨附件」（1959年4月7日），〈情報——國內政軍情資及對中共情蒐策反工作〉，《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6-00051-005。有關1959年前後臺方對藏工作及其與美方之競合與分歧，參見楊瑞春，《國特風雲：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秘檔》（臺北：稻田出版公司，2010年），頁309-311、411-413；林孝庭，〈冷戰與西藏問題〉，收入氏著，《臺海·冷戰·蔣中正》，頁201-237。

⁵⁶ 《蔣中正日記》，1963年3月24日；《蔣經國日記》，1963年4月15日、1964年4月3日。

局物資均在此卸貨轉運，由該局助理副主任負責與後門小組聯絡。基於保密要求，臺方人員僅能在基地密室內活動，並定期輪調。⁵⁷

1964年5月27日尼赫魯逝世，蔣經國於次月日記寫下：

尼赫魯已死，而英國受到法匪之刺激，這一方面的局勢已有變化，對於英、印似有爭取之可能與必要。兩個中國之製造，為列強之共同希望，勢將出之於顛覆。對於美、日兩國支持「臺獨」之陰謀更應注意，故鞏固臺灣最為重要。反攻應自西南：（一）臺海大戰為國際所畏懼；（二）東南山嶺地帶難攻易守；（三）有東南亞和印度可作運用。⁵⁸

蔣經國擬思考將反攻重點由東南轉自西南，除考量國際上始終畏懼臺海戰爭以及因地理形勢進攻東南難度較高外，亦著眼於英國對本年初法國與中共建交仍保持觀望、印度與中共關係仍未改善，似認定英國影響力深厚、具戰略地緣作用的東南亞與印度可資運用，也有藉此制衡美、日等國日益向中共傾斜，並防止臺獨分裂勢力之意。

1964年10月，中共首次核彈試爆成功，進入核武大國之列，對區域威脅更甚。1965年初美國採行將越南戰爭逐步升級戰略，戰況慘重，同年4月印巴因邊界衝突爆發戰爭，中共一方面陸續向北越派出龐大志願部隊，一方面聲援巴基斯坦，至9月以照會強力施壓印度，美國與中共角力激烈化。蔣經國於日記再以中共南向擴張意圖昭然，美國必將轉向臺方求援，臺方反攻大陸有利時機終將到來，強調自助的重要：

共匪勾結巴基斯坦，發動印巴戰爭，其目的在分散美國力量，一也，離間印、巴關係，二也，拆散巴基斯坦與自由世界反共國家的關係，三也。共匪之最重要意圖，乃在掌握巴基斯坦，控制印度半島，乃是共匪

⁵⁷ 「葉翔之呈報蔣經國後門小組相關報告暨附件」（1965年10月7日），〈敵後工作（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100-00103-008。報告指出，小組成立次月於修繕圍牆天線時，發現除美方人員外，尚有4、5位「我國同胞」，經探詢始知為美印合作舉辦訓練之反共藏人。又葉翔之呈報同月，黃德美曾赴印度。參見《蔣經國日記》，1965年10月15日。

⁵⁸ 《蔣經國日記》，1964年6月20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向外擴張的有計劃行動之一個步驟，對我復國的大局而言，共匪的如此瘋狂行為是有利的，長此下去，美國必將失去其對於局勢的控制力，今後局勢的發展，美國必將有求於我們，最要緊的還是要靠自己能夠站起來！⁵⁹

與此同時，蔣經國已奉命出任國防部長，因應亞洲戰局，除廣東登陸計畫外，復提出空降西南、占領西南方案，旋遭八六海戰失利打擊。同年9月，蔣經國再度踏上美國國土，與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進行會談。蔣指出，朝鮮半島、臺灣以外，中共具重大利害關係的區域之一為東南亞，現已延伸至印度；中共為了向南方擴張，尤其將注意力集中在越南與印度，目標在如同「伸出十根手指」般使美國資源消散。在麥納瑪拉詢問蔣經國對未來5-10年印度於亞洲角色的看法時，蔣僅回應表示不認為中共有能力在印度進行大規模活動，而是想通過在邊境製造糾紛，來挑起印度內部麻煩，以致麥納瑪拉有感蔣經國事實上並未能就印度的可能作用加以答覆。⁶⁰

兩蔣為反攻大陸與反共戰爭目標，面臨美國忌憚於蘇聯、反對與中共大規模戰爭，對美國力爭不懈，以印度與西南邊區距蘇聯遙遠為由，作為反攻據點，仍以政治作戰為名，實行有限度軍事偵襲、游擊滲透。臺方力促美國與中共對立為敵，相當程度牽制、延遲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外交戰場上則歷經西方大國法國與中共建交重挫後，對尼赫魯遽逝後的印度局勢仍保持觀望，暫無具體作為，以下討論之。

⁵⁹ 《蔣經國日記》，1965年9月18日。

⁶⁰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all o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by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Defense” (September 22, 1965), in Harriet Dashiell Schwar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pp. 209-214. 美方雖於蔣經國此次訪美期間再度否決臺北當局空降西南計畫，然而兩蔣仍未放棄，持續由國防部情報局研擬並執行建立西南邊區游擊武力計畫，範圍以緬甸、寮國、泰國邊界為主，參見「葉翔之呈蔣經國報告」（1966年3月22日、7月9日，1967年3月4日、3月11日，1968年12月11日），〈敵後工作（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100-00103-007、003、004、005、002。

三、臺北外交部對尼赫魯逝世後印度局勢的因應方針

尼赫魯逝世後，臺北外交部為印度政局引起世界各國注視，分析印度局勢發展及臺印關係未來趨勢，部長沈昌煥簽呈行政院長嚴家淦相關因應方針。沈昌煥指出，印度新任總理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 1904-1966）兼外交部長為一中立右傾者，態度反共，雖宣布持續對內實行社會主義，對外執行尼赫魯之不結盟政策，其內閣亦包括尼赫魯之女、立場左傾的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 1917-1984）為宣傳部長，然短期內似無與中共妥協的可能，對西方國家似亦趨接近。綜觀世界情勢，可知今日印度，在亞洲以至於全世界仍具有相當影響力，尤其印度打擊中共的宣傳對臺方不無裨益，似應把握此一時機，繼續積極爭取。⁶¹

沈昌煥接著話鋒一轉，指出印度受英國統治甚久，對英國政治觀點習染甚深，又為大英國協會會員國，除非世局發生重大變化，恐怕一時難以指望其外交政策有重大變更。沈因而指出，加強對印度工作目的仍在求先建立非正式關係，然後進一步使印度改變對中共及對臺北方面態度，做到使印度在聯合國大會及其他國際會議中對中國代表權問題放棄「排我納匪」立場，進而改投棄權票。對照外交部亞太司內簽研議意見，亦有「目前我對印度並無過分奢望，只要印度能與匪共維持對立關係，且支持我方在聯大代表權立場」，則雙方關係自可日趨好轉的評語。⁶² 顯見對臺北外交部而言，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實為對印度工作的重點所在。

沈昌煥簽呈所擬對印度工作意見，其中較具新意者，為經濟方面擬酌情採取二步驟：（一）考量印度因糧荒急需米糧，擬先行以米試銷印度，後再及其他，並酌向印度增加採購。（二）透過民間團體或聯合國有關機構設法邀請印方農工技術人員赴臺考察或參加農、工業講習。此外則擬促進對印聯繫工作，包括邀請各界人士訪臺，令飭駐聯合國及駐外使節相機增加接觸，請中央黨部及僑委會加

⁶¹ 「沈昌煥簽呈行政院院長」（1964年7月11日），〈尼赫魯去世後印度局勢之發展我方因應方針〉，《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3/4-5-4-31/2/0001。夏斯特里就任總理前，內政部長南達（Gulzarilal Nanda）曾短暫代理，夏斯特里於1965年領導印度對巴基斯坦戰爭，1966年1月於簽署「印巴停戰協定」次日猝逝，再由南達代理，至同月下旬甘地夫人接任為止。

⁶² 「報告資料：尼赫魯去世後印度局勢之發展及我如何爭取印度之方針」（1964年6月11日），〈印度資料〉，《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99-0015。

強聯絡僑領，強化中印緬文化協會工作等。宣傳方面則擬大量贈送蔣介石所著《蘇俄在中國》之英文版及有關臺灣土地改革、經濟發展等書刊，內容保守，尤其以臺北當局為中心的反共訴求，未能就印度情勢著墨，恐難引起多數印人共鳴。⁶³

1964年11月，亞盟中國總會在臺擴大舉辦第十屆亞盟會議，臺北迎來了一個由印度自由黨籍國會議員白德爾（Dahyabhai Patel）帶領，包括國大黨籍國會議員辛哈（Satya Narayan Sinha）、史瓦魯普等亞盟考察團。其中辛哈由於是印度執政黨籍議員第一位訪臺者，反共立場堅定，尤其受到注目，曾向沈昌煥要求提出臺方在與印度邊界問題上，有別於中共立場的聲明，遭到婉拒。⁶⁴辛哈在臺期間除參觀農工業實況外，並強力要求而獲安排赴金門參觀軍事設施。蔣經國應辛哈多次求見而與之會面，卻因辛哈俄語頗為流利，並有情資指出辛哈近期內曾受邀訪問蘇聯，得赫魯雪夫協助勘查邊界，蔣懷疑其可能為蘇聯間諜，故對其所問多未作答。⁶⁵白德爾返印後曾向總理夏斯特里建議讓臺灣在印度設代表機構，惜夏斯特里猝逝未果。⁶⁶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國情不同，臺方爭取印度在野人士，隨即面臨雙方對民主國家往來見解歧異。亞太司奉示為加強與印度雙方訪問內簽研議意見，參考前

⁶³ 「沈昌煥簽呈行政院院長」（1964年7月11日），〈尼赫魯去世後印度局勢之發展我方因應方針〉，《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3/4-5-4-31/2/0001。嚴家淦於簽呈上批示：「原則可行」，依據沈鈞所述，時任行政院院長嚴家淦於次年曾當面向沈鈞表示，對外交部過去所採取關門政策感到遺憾。參見沈鈞，《我的一生——沈鈞回憶錄》，第五冊，頁8。

⁶⁴ 「沈昌煥接見印度議員辛哈、報人那拉揚談話紀要」（1964年11月16日），〈印度人士訪華〉，《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100900-0046。

⁶⁵ 「外交部致國防部禮賓處函稿」（1964年11月16日），〈印度人士訪華〉，《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100900-0046；《蔣經國日記》，1964年11月27日。依據外交部檔案同卷收入亞東太平洋司所備簡歷，辛哈1913年生於印度比柏哈省（Bihar），早年曾赴俄接受共產國際訓練及游擊訓練，並獲上尉官階，返印投身獨立運動。當選國會議員後，在國會中對尼赫魯對華政策多所詰責。1959年曾赴西藏搭救達賴喇嘛入印，並曾由赫魯雪夫供以飛機詳察邊界地形。

⁶⁶ 陳牧民，〈解密臺灣與印度外交檔案：1962年中印戰爭後的臺印互動關係〉（2020年7月7日），收錄於「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sino-indian-war-taiwan-secret-diplomatic-archives/>（2023/02/24點閱）。

述印度自由黨秘書長馬薩尼於1963年10月訪臺時當面向沈昌煥提出臺方宜派在野黨立委赴印訪問，建議待時機成熟時，似宜遴選包括民社黨、青年黨籍立法委員答訪印度，不為沈昌煥所採納。⁶⁷ 11月亞太司簽呈擬具辛哈等來訪談話參考資料，其中有「關於我派國會訪問團訪問事」一節，建議向辛哈表示如印方正式邀請，臺北立、監委員及國大代表可組訪問團赴印度答聘，盼辛哈返國後向印度有關方面，諸如國會負責人等洽商，認為此事如實現當可增加雙方了解。沈昌煥則批示：「暫不提為宜，我內部困難甚多！」⁶⁸ 反映1960年代內政對外交發展的可能制約。

伍、聯合國席位危機中對印度的爭取

一、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地位再次危機：爭取印度之急要與阻滯

自1961年臺方邀請第一位印度國會議員普拉塔普來訪，1963年初密使張國興訪印聯繫安排，同年秋印度自由黨秘書長馬薩尼來訪請見總統等，俱由新聞局負責主要工作，面對層峰著重與印度軍事情報合作，尤其密使任務失敗前車之鑑，外交部對印度態度相對消極，只等待未來適宜時機先行建立非正式關係，謀求使印度與中共維持對立，目標在緩和乃至解除印度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壓力，以確保中華民國席位。1965年5月，與印度有長久淵源的沈錡時任駐美國公使，奉召返臺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同年10月，沈昌煥批示：「我在外交上須設法與印度聯絡」，「如何設法與印度聯繫一事甚急要，希沈次長仔細考慮可行步驟」，頗不尋常。⁶⁹ 衡諸當年國際形勢，沈昌煥一改先前保守態度，亟欲爭取印度，似

⁶⁷ 「報告資料：尼赫魯去世後印度局勢之發展及我如何爭取印度之方針」（1964年6月11日），〈印度資料〉，《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99-0015。

⁶⁸ 「與印度國會議員辛哈博士及報人那拉揚談話時參考資料」（1964年11月11日），〈印度國會議員訪華（四）〉，《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2-0031。

⁶⁹ 「外交部致國防部代電擬稿」（1965年10月15日批示）、「袁子健致外交部部次長電」（1965年10月17日收電、批示），〈中印交換情報〉，《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4/4/1/0001。

與當年聯合國大會審議中國代表權案情勢嚴重有關。

按1961年美國雖成功以「重要問題案」取代「緩議案」，維持中華民國席位，然此後阿爾巴尼亞等國所提「恢復中共合法席位將蔣政權代表排出案」即臺北當局所謂「排我納匪案」得於聯大年提出投票。第三世界新興國家逐漸形成關鍵力量，西方國家如英、法等先後表明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投票不與美國一致行動，情勢已大不如過往。1965年9月，行政院院長嚴家淦邀集有關人員研商關於當年第二十屆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應策略，咸以該年情勢較以往嚴重，不利因素包括：（一）不結盟國家主張中共取得中國席位，對一般亞非國家加強壓力；（二）法國積極為中共策劃，非洲法語國家不免受其影響；（三）若干邦交國持「兩個中國」觀念，兼以美國輿論預測等負面影響；（四）由於越戰等影響，部分國家認為美國過多干涉他國內政，不願再支持美國投票策略。臺北當局會商決定仍採取正面擊敗實質案的「排我納匪案」辦法，並側重程序案的「重要問題案」，以策安全。⁷⁰ 印度作為不結盟陣營主要國家，因而成為臺灣為盡速增強外交形勢，急切爭取的目標。

外交部此際致力開拓與印度官方聯繫管道，至少從三方面進行嘗試。一是謀求以軍事情報為外交籌碼，商定日本東京為雙方會面地點：繼前述後門小組於1964年成立，1965年中以後沈錡、史瓦魯普等幾度商洽，建議參照張國興前議，應印度需求提供有關中共的軍事情報，由兩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負責聯繫，並獲悉印度軍情局亦同意在東京試行遞交工作。史氏等承諾，待印方取得情報後，可透過國防部長就印度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態度，為臺方向總理夏斯特里進言。⁷¹ 10月中旬，駐日大使魏道明致電沈昌煥指雙方駐日武官已取得聯絡，沈昌煥旋致函蔣經國建議立刻採取行動。⁷² 國家安全局次月中旬復函外交部，同意為把握當

⁷⁰ 「關於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屆常會審議所謂中國代表權案經過節要」（1965年11月），〈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屆常會中國代表權案〉，《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49903-0045。

⁷¹ 「沈昌煥致蔣經國函稿」（1965年10月16日擬稿後銷稿）、「沈昌煥致蔣經國函」（1965年11月3日），〈中印交換情報〉，《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4/4/1/0001。

⁷² 「魏道明致沈昌煥電」（1965年10月14日）、「沈昌煥致蔣經國函」（1965年11月3日），〈中印交換情報〉，《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4/4/1/0001。值得一提的是，沈昌煥致蔣經國函10月初稿，稱「外交上爭取印度，不僅能使印度在聯合國及其

前時機，積極廣泛加強對印度關係，已另函請國防部情報次長室轉飭駐日武官縝密進行。⁷³

二是爭取以土耳其為雙方一般性聯繫地點：據臺灣駐土耳其大使袁子健1965年10月中旬回報外交部電文表示，已與印度駐土大使取得聯繫，並告知印使，臺灣擬以土國首都安哥拉為初步聯繫地點，有關交換中共情報及注視中共動向各節，臺方均可同意，願供給實際資料，以備印方參考。印使答稱已將此前談話詳細報告印政府，極願保持聯繫，增加對中共情勢了解。⁷⁴ 此時兩國已指定日本為交換情報處，安哥拉則被臺方視為日後與印方一般性聯繫地點。

三是雇用在印華僑為臺方工作並轉經東南亞通信聯絡：外交部為推展對印度工作，經沈錡數月安排，透過美商有利股份有限公司（United Exports, Inc.）經理諾達爾（H. F. O. Noether）居間聯繫，1965年12月正式僱用旅居印度加爾各答的僑商朱如青（Paul Z. C. Chu）為聯絡員，並為保密起見，由駐吉隆坡領事館、駐泰國曼谷大使館分別於當地租借郵政信箱，轉寄往來郵件，來函信封避免有外館館銜或官方樣式等。亞太司所擬朱如青工作項目，包括聯繫印方各界，接洽訪問及委辦事項，洽送文稿予印度報章雜誌，隨時酌擬報告、購寄印度近期政經書刊及剪報等，以增進雙方了解。⁷⁵ 朱如青歷次提交報告，包括印度政要人名錄與簡歷，印度外交部組織與人事近況，印度主要政黨生態與政治主張、對中共評估等。

未料朱如青受僱未及半年，即致函外交部建議應與史瓦魯普研究設立領事館的可能性，甚且要求授予朱本人名譽領事職位。然則無論是在印度設立官方機構，或者賦予朱如青某種名義，俱為外交部所無法接受，臺方迄未在有「匪館」之國家內設立名譽領事，在印度未與中共斷交前，臺方不便在印度設立領事館，主要

他場合中，對我發生有利之影響，即將來反攻大陸，亦可收以印度牽制共匪兵力之效」，11月發函已刪去反攻大陸相關字句。

⁷³ 「國家安全局致外交部函」（1965年11月19日），〈中印交換情報〉，《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4/4/1/0001。

⁷⁴ 「袁子健電外交部部次長」（1965年10月16日發電），〈中印交換情報〉，《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4/4/1/0001。

⁷⁵ “H. F. O. Noether to Sampson C. Shen”（1965年11月8日）、「外交部亞太司致駐吉隆坡領事張仲仁代電」（1965年11月11日）、「外交部亞太司呈部次長」（1965年11月19日），〈對印度聯絡工作（一）〉，《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2-0058。

即是為避免自行默認有「兩個中國」之存在。⁷⁶ 此後檔案即少見雙方通信，朱如青不久遭停止僱用，史瓦魯普成為臺北外交部與印度官方聯繫之唯一窗口。⁷⁷

另一方面，臺方與印度情報合作自1964年8月後門小組成立，1965年10月雙方接洽同意在日本交換中共軍事情報，未及二年，印方已有不滿之意。1966年3月沈錡赴新德里出席聯合國亞經會大會期間，印度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辛達利（Daleep Singh）上校即向其表示，印方對臺方所供情報不甚滿意，希望未來情報交換工作能夠改進，充實情報內容。印方所願獲悉者為中印邊界共軍的軍力、番號、駐地，西藏有無飛彈基地，以及西藏、新疆一帶共軍裝配、交通、運輸容量等，若臺方所提供的情報繼續不為印方所重視，對於增進雙方關係自然難有成效。⁷⁸

二、沈錡訪印與印度「一中一臺」傾向分析

1966年1月，印度總理夏斯特里猝逝，立場左傾的甘地夫人繼任。⁷⁹ 3月沈錡以出席聯合國亞經會大會代表名義赴新德里從事對印度工作。據沈錡返國後上呈報告，臺方代表團出席亞經會消息發布後，以印度外交部次長辛諦納（Dinesh Singh）為主的左傾及親中共人士，預料該團赴印定將從事加強對印關係活動，遂力促總理甘地夫人在該團抵達前即發表支持印度進入聯合國的談話。該團抵印後甘地夫人復通令政府各部門，要求印方人員避免與出席亞經會的各國團員作任何正式來往。沈錡指出，甘地夫人此舉顯然為限制該團對印方的活動，該團於

⁷⁶ 「駐吉隆坡領事致外交部亞太司代電關於轉寄朱如青密件事」（1966年3月15日）、「外交部亞太司呈部次長」（1966年4月28日）、「外交部致朱如青函」（1966年4月30日），〈對印度聯絡工作（二）〉，《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2-0059。

⁷⁷ 「外交部亞太司呈部次長」（1968年12月24日），〈中印緬錫文化經濟協會（一）〉，《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11905-0001。

⁷⁸ 「沈錡致外交部部長電並轉呈總統府秘書長」（1966年3月27日），〈中印（印度）外交關係文件〉，檔號：A303000000B/0052/3110602/0023/001。

⁷⁹ 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 1917-1984），尼赫魯之女，生於阿拉哈巴德，英國牛津大學肄業。早年隨父參與印度獨立運動、獨立後協助其父政務，1959年當選國大黨主席，1964年出任沙士德內閣宣傳部長，1966、1980年兩度出任印度總理，1984年10月於任內被刺身亡。任內致力改革農業，消除印度貧窮，對外延續不結盟政策路線，並發展核武、強化國防，作風強硬、集權，有「印度鐵娘子」之稱。

當地尚且遭印度特務纏擾。然沈錡此行仍得於各種場合會晤若干對臺方友善的政要，包括外交部長辛雙郎（Swaran Singh）等政府閣員、國會議員、前聯合國大會主席潘迪夫人（Vijaya Lakshmi Pandit），以及曾訪臺的馬薩尼等。⁸⁰

據沈錡觀察分析，印度官方對華政策不易改變的主因，包括：（一）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低估臺方軍事經濟實力，恐懼中共入侵，不願開罪中共；（二）印度欲挾蘇聯以制中共，以蘇援平衡美援，且蘇聯在印聲望甚高，有巨大影響力；（三）美國對臺態度過於謹慎，不願強迫印度採取反共措施，甚至沈錡赴印前曾於臺北面託美國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邦迪（William Bundy）預先電告美國駐印度大使館與臺方代表團合作，此行卻始終未能會見美國大使鮑爾斯（Chester B. Bowles），事後邦迪答覆臺北外交部詢問，僅表示遺憾，指鮑爾斯或以為接見沈錡可能對該團不利等理由搪塞。⁸¹ 其他因素尚有前述西藏問題與邊界麥克馬洪線問題等傳統歧見、情報供應未能滿足印方、次年大選國大黨應可獲勝而仍由甘地夫人續任總理等。

沈錡的長篇報告中最值得關注的或許是以下段落：

我國策所示漢賊不兩立之立場不亦為印人所理解，我國之基本與南韓、越南、及西德三國不同，我國駐外使節不容與偽使並存，而在新德里、南韓、北韓、南越、北越同時均設有總領事館，西德設有大使館，東德則派駐規模龐大之貿易團。本團在新德里開會時，東德副總理並來作官方式訪問。故自印度政府看來，韓國、越南、德國等分裂國家，僅分別代表其所控制之地區，並不一定要印度視之為代表全國，印外長特別提出此點，謂渠深知臺灣之中華民國政府自認係代表整個中國，故印度既已

⁸⁰ 「訪問印度報告」（1966年4月），〈沈錡次長訪印度〉，《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5/12.21/2/0001。

⁸¹ 鮑爾斯（1901-1986），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春田市，耶魯大學理學士，民主黨籍，曾任康州州長、國務次卿，並於1951-1953年、1963-1969年兩度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任內致力提升美印關係，主張美國應追求亞洲區域權力平衡，發展與區域內大國關係，反對長期偏重與臺灣、南韓、南越等小國關係，導致美國軍力嚴重耗損。“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2, 1965), in Gabrielle S. Mallon and others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V,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p. 464-465.

承認北平，即不便再承認臺北。換言之，假如中華民國僅代表臺灣，自較容易處理。由此可見，必須印度官方決心與匪偽斷絕外交關係之時，始能談到對我復交問題。⁸²

印外長辛雙郎或許因深知臺方強硬立場，此言在為打消臺方對與印度發展進一步關係的可能期待，然沈錡文句間所呈現臺方主張係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部分原則，與印度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立場截然對立，實難以彌合。

前述1961年8月尼赫魯於印度下議院談話，暗示「一中一臺」立場。與印度同為大英國協之英國、加拿大等會員國，1960年代有部分傾向類似理念者，「一中」在於承認或盡早承認中共，並尋求與之擴大交往，「一臺」則認為臺灣島住民具有自決權利，並無證據顯示臺灣人民同意其未來交由中共處置。據日後英國外交部研究部門報告指出，印度鮮少公開談論臺灣地位問題，儘管印度在戰後對日和約協商期間曾一度主張日本正式歸還臺灣給中共，最終仍簽署和約，似有暗示接受臺灣地位未定之意。⁸³

1963年6月，史瓦魯普曾轉寄臺北當局一則題為〈印度必須承認臺灣〉（India Must Recognise Formosa）的報導，反映部分印度人士類似理念。⁸⁴該報導指出，印度首都有大量明確輿論期望看到印度政府放棄其對蔣介石政府不友

⁸² 沈錡報告次月由沈昌煥密函張羣轉陳蔣介石。「張羣致沈昌煥函」（1966年5月2日），〈沈錡次長訪印度〉，《外交部檔案》，檔號：A303000000B/0055/12.21/2/0001。上標為作者所加。

⁸³ 英國早於1950年承認中共，並建立代辦級關係，1972年簽署聯合公報升格為大使級關係。加拿大則於1970年與中共發表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公報內所作對臺灣地位問題立場的申明，係首見於中共與其他相關國家間的建交文件者。“Sovereignty over Taiwan: Views of Other Nations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December 22, 1971), Far Eastern Department: Registered Files, Records of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CO 21/864,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Kew, U.K.

⁸⁴ 「谷正綱致函外交部附送史瓦魯普寄來剪報乙份」（1966年6月29日），〈中共與印度邊界衝突〉，《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91204-0011。該報導刊登於週刊*Flame*, Vol. V No. 14 (June 15, 1963), p. 25。印度因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並顧慮阿拉伯國家感受，雖於1950年承認以色列，1953年僅准許以色列於孟買開設領事館，至1992年兩國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

好政策，並至少有限度地承認臺灣政府所代表的島嶼國家，而非代表中國本土或第二個中國。理由其一，蔣政府已完全控制臺灣島十餘年，無法抹滅其存在；其二，蔣政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整體而言對印度態度友善；最末，印度於其外交關係向來不持偏見，對給予法理上或事實上政府的承認，不取決於該政權的性質。臺灣政府既滿足相關規範要件，印度即應給予承認。該報導主張，當前蘇中共關係持續惡化，加以邊界衝突後印度為孤立中共，與其他共產陣營國家維持友好關係等因，印度不需過度顧忌。如印度過往承認以色列，雖因政治考慮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准許以色列於印度開設領事館，給予臺灣承認實有前例可循。

最終印度朝野「一中一臺」理念並未具體化為政策，臺北方面亦未予考慮。經臺北外交部諸般努力，1965年聯合國大會於「重要問題案」投票獲通過，「排我納匪案」投票結果雖未達三分之二門檻，卻首次正反方票數相同。1966年3月沈鎬於訪印期間，特別向其外交部次長等表態，倘印度能不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則臺方在印巴有關喀什米爾爭議問題上可支持印度，以為交換條件。⁸⁵ 同月甘地夫人訪美，於全美記者俱樂部演說時表示，印度與中共衝突原因不限於邊界問題，實係民主制度與共產理論之爭，與前述尼赫魯所言中共出兵起因於中國本位主義，與共產主義無關，已有相當差異。儘管印度與中共關係陷於低谷，中共因同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遭國際譴責，印度於聯合國大會各次投票不曾就中國代表權問題改變其支持中共為合法中國政府的立場，至1971年中共取得聯合國席位。

陸、結論

本文探討1961-1966年間尼赫魯逝世前後印度對華政策變動時期，臺灣自接待首位印度國會議員訪臺展開接觸，隨後印度與中共爆發邊界戰爭，臺方將之擴大定位為世界性反共、反侵略戰爭，派密使前往試探，盼印度由中立的不結盟陣營轉向反共陣營。臺方對印度開展關係目的，於蔣介石父子著重在反攻大陸戰場

⁸⁵ 「『如何維護我在聯合國大會第二十一屆常會中代表權案』外交部會商紀要初稿」（1966年4月22日），〈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屆常會中國代表權案〉，《外交部檔案》，典藏號：020-049903-0045。

上對中共產生牽制作用，嘗試於印度邊境推進西南敵後滲透工作，於外交部則為增強外交形勢，爭取不結盟國家，以確保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與政權合法性。臺印雙方關係於即將開展之初即遭遇蘇聯與中共阻撓，美國亦不願介入，過程曲折。

進一步言之，臺印層峰為與中共抗衡，皆以軍事情報合作為重，利益有所交集。然而基本立場差異懸殊：其一，臺北當局心繫反共，印度不以美蘇對立之意識形態為重。其二，印度所關注西藏問題與中印邊界麥克馬洪線問題，由於臺方對中國大陸主權與統治權主張，與印方歧異難以化解。其三，印度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朝野有傾向「一中一臺」理念者，難為臺方所接納。1966年以後，臺方反攻計畫已無限期擱置，印度等不結盟國家在聯合國支持中共入會並未改變。兩國層峰基於各自理由短暫交會，隨時勢推移，尤其情報合作成效不彰，共同利益有限，失去發展關係的時機與動力。臺印此後維持有限互動，至冷戰結束初期始有突破。

從亞洲冷戰格局探究此階段臺印關係開展曲折歷程，至少有三方面意義：其一，臺方以反攻大陸與反共戰爭為戰略目標，面臨美國忌憚於蘇聯、反對與中共大規模戰爭，兩蔣對美國力爭不懈，以政治作戰為名，實行有限度軍事偵襲、游擊滲透，乃至亟思運用印度與中共矛盾，以西南邊區距蘇聯遙遠為由，作為反攻作戰據點。臺方力促美國與中共對立為敵，相當程度牽制、延遲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美國繼續支持臺北當局地位。其二，印度為發展國防，制衡近鄰中共、巴基斯坦，成功爭取蘇聯援助、關係深化，其不結盟中立政策服務於國家安全與大國戰略，實力因素亦決定了印度對臺發展關係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其三，冷戰時期臺印互動關係因軍事情報合作而起落，隨著臺灣反共復國意識逐步消散，蘇聯解體前後印度發展東望政策，雙方得以再度展開接觸。冷戰結束初期儘管中共仍為臺印雙方制衡目標，軍事對抗不再是核心，共同利益已延伸至經濟層面了。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中共與印度邊界衝突〉。
 - 〈中印緬錫文化經濟協會（一）〉。
 - 〈印度人士訪華〉。
 - 〈印度反對黨領袖Minocher R. Masani（馬薩尼）訪華〉。
 - 〈印度國會議員訪華（四）〉。
 - 〈印度資料〉。
 - 〈情報司雜卷：五十一至五十二年（三）〉。
 - 〈對印度聯絡工作（一）〉。
 - 〈對印度聯絡工作（二）〉。
 - 〈營救印匪邊境糾紛而被捕之反共華僑（一）〉。
 - 〈營救印匪邊境糾紛而被捕之反共華僑（二）〉。
 - 〈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屆常會中國代表權案〉。
 - 〈籌開亞洲人民反共會議〉。
- 《外交部檔案》（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中印（印度）外交關係文件〉。
 - 〈中印交換情報〉。
 - 〈尼赫魯去世後印度局勢之發展我方因應方針〉。
 - 〈沈錡次長訪印度〉。
 - 〈張國興赴印度工作〉。
 - 〈邀請無邦交國家訪華〉。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臺北，國史館藏）
- 〈王森（王立森）〉。
 - 〈黃德美〉。
- 《蔣中正日記》（臺北，國史館藏）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總統事略日記50.04~50.06〉。
- 《蔣經國日記》（臺北，國史館藏）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中印（度）關係〉。

〈外交——蔣介石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八）〉。

〈情報——國內政軍情資及對中共情蒐策反工作〉。

〈敵後工作（二）〉。

Records of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Kew, U.K.

Far Eastern Department: Registered Files, FCO 21/864.

二、史料彙編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三「書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1984年。

陳誠著，林秋敏等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三冊。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廖文碩主編，《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彙編（1946-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年。

Keefer, Edward C., and others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Mallon, Gabrielle S., and others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V,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Schwar, Harriet Dashiell,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三、文集、回憶錄、傳記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二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第五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Palat, Madhavan K.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69*.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6.

- Palat, Madhavan K.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70.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7.
- Palat, Madhavan K.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2, Vol. 80.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9.

四、報紙

《中央日報》，臺北，1961、1963年。

五、專書

-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
-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臺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21年。
- 許文堂，《理想與幻滅：中華民國外交史的1960年代》。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1年。
- 陳鴻瑜，《揭密：冷戰時期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軍事關係》。臺北：學生書局，2022年。
- 楊瑞春，《國特風雲：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秘檔》。臺北：稻田出版公司，2010年。
- 福田圓著，林倩仔譯，《中國外交與台灣：「一個中國」原則的起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譯自《中国外交と台湾：「一つの中国」原則の起源》。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
- 戴超武主編，《亞洲冷戰史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
- Ma, Joy and Dilip D'Souza. *The Deoliwallahs: The True Story of the 1962 Chinese-Indian Internment*. New Delhi: Pan Macmillan India, 2020.
- Madan, Tanvi. *Fateful Triangle: How China Shaped US-India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0.
- Tucker, Nancy.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Westad, Od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六、期刊論文

牛大勇，〈「拴緊韁繩」與「反攻大陸」：肯尼迪與蔣介石的戰略之爭〉，《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37卷總200期（2000年7月）。

沈志華，〈近年來冷戰史研究的新趨向〉，《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6期（2012年6月）。

Stolte, Caroline. “Raja Mahendra Pratap’s Pan-Asian projects (1929–1939).” *Modern Asian Studies*, 46:2 (March 2012), pp. 403-423.

七、網路資料

陳牧民，〈解密臺灣與印度外交檔案：1962年中印戰爭後的臺印互動關係〉（2020年7月7日），收錄於「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sino-indian-war-taiwan-secret-diplomatic-archives/>（2023/02/24點閱）。

Hunter, Edward, “Defeat by Default,” *American Mercury*, September 1952, p. 43,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3.<https://archive.org/details/defeat-by-default.-american-mercury-september-1952-pp.-40-51/page/43/mode/2up>.

